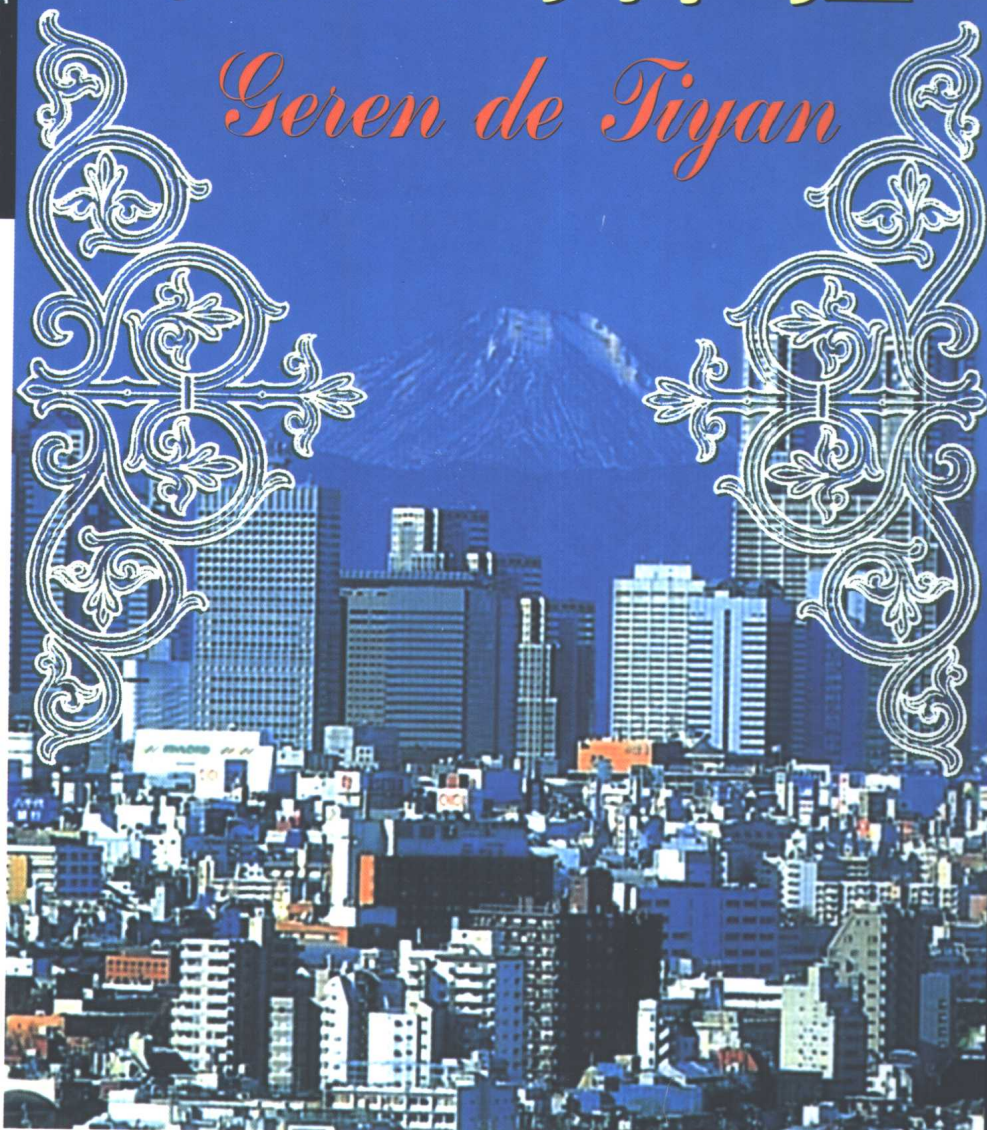


Geren de Tiyan Geren de Tiyan

[日] 大江健三郎

个人的体验

Geren de Tiy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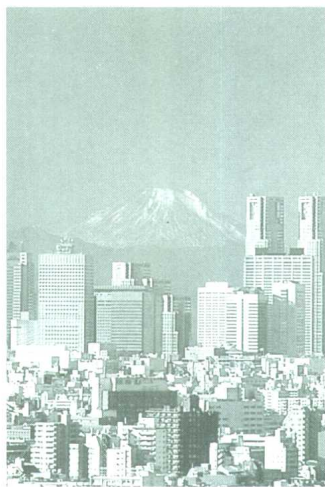
Geren de Tiyan Geren de Tiyan

北京燕山出版社

[日] 大江健三郎

个人的体验

王中忱 邱雅芬 / 等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个人的体验／(日)大江健三郎著；王中忱等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11

ISBN 7-5402-1286-1

I. 个… II. ①大…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②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096 号

责任编辑：牛胜福

个人的体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大 32 开本 17 印张 445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50 元

存在的焦虑与灵魂的建构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历程及其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关系

“峡谷村庄”：多义的空间

大江健三郎是从大学时代开始步入文坛的作家，从1955年在东京大学《学园》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火山》算起，他的文学道路已经走过了四十多个年头。但如果追溯他文学道路的原点和想像力的源泉，却必须从日本的一个小小村庄谈起。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作为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登上瑞典皇家文学院讲坛发表受奖演说的时候，首先说起的就是他故乡的村庄^①。

大江健三郎的故乡位于日本南方四国岛上的爱媛县，县内多山，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掩藏在丛山峻岭里的喜多郡大瀬村（现名内子町大瀬村）。村子四周是遮天蔽日的森林，村子下面的山谷有河水流过。大江在这里长到15岁，他经常把故乡称作“峡谷里的村庄”。

大江健三郎出生的年代，日本已经形成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帝国专制体制，国家的政治管制和意识形态通过行政、教育等渠道，灌注到这个远离日本本州的峡谷村庄。1941年4月，大江健三郎6岁，进入村里的小学读书。而就在这一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学校令”，把初等教育机构改称为“国民学校”。在准备发动太平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中国，《世界文学》1995年第2期，许金龙译。

洋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这一做法用意很明显，就是要强化国内的思想统治。读读大江健三郎在国民学校时候的作文，可以看到这种统治所产生的效果：

“麦田刚刚泛青，我走在田间小路上，温煦的春风微微拂过，轻轻抚摩着我的头。我边走边想，和那些出生在外国的人相比，我们生长在强大的日本国实在是太幸福了。”（转引自《大江健三郎全作品集6年谱》，日本，新潮社，1977年11月）

作文里的灿烂春光和幸福情绪，很少属于少年作者的真实感受。据大江后来回忆，他在国民学校里真正感受到的，其实主要是压抑和恐怖。在学校里，老师经常向他们这些小学生发问：如果天皇让你去死，你怎么办？小学生必须回答：我就去死，剖腹自杀！尽管这样回答的时候，孩子们常常吓得脸色苍白，四肢发抖。如果谁回答得慢了，教师就会拳打脚踢。大江就是经常遭受教师拳脚的一位。天皇的肖像悬挂在学校专门建造的奉安殿里，少年的大江健三郎虽然不无好奇，却从来不敢直视一眼^①。

在专制的军国主义年代，村子里的大人们更处于恐怖的气氛中。在同一组回忆文章里，大江写到，那时，他的哥哥被征为预备兵，他的全家陷入了混乱。但他的父亲当着外人却必须赞美预备兵制度，他的母亲和姐姐也只能在没有外人的场合，在自己家里的时候才敢呈现出愁容。大江的哥哥，还只是一个只会写诗歌颂美丽少女的耽于幻想的学生，丝毫没有所谓的帝国男人气概，但在村里人举行的送别会上，却要昂首挺胸地说：乡亲们，我要为国家而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9—20页，日本，文艺春秋株式会社，1965年3月。

献身,战死!^①

当然,国家意识形态并不可能完全充满峡谷村庄的全部空间。正如大江后来概括的那样:“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里,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②少年时代的大江健三郎,还不能辨识官方历史、学校教科书的记载和民间口头传承的对立,他徘徊于二者之间,“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他“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的环境中^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昭和天皇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投降,日本的现代历史发生转变。当天皇的声音通过电波传到大濑村的时候,年仅13岁的大江健三郎还不能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

“我站在夏日庭院的强烈阳光里,奇怪地向光线暗淡的屋内张望,大人们都站在收音机前面痛哭。

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些无聊,就跑出去玩。大人们都在家里听收音机,村路上只有孩子们,我们东一伙西一伙地相互交谈。

没有谁能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天皇用普通的成年人的‘人的声音’说话

① 大江健三郎:《战后一代的印象·国家》,《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27页。

② 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2000年9月27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国青年报》2000年9月28日。

③ 大江健三郎:《致北京的年轻人》,《中国青年报》2000年9月28日。

这样一个奇怪的和我们的期待大相径庭的事实。我们都不明白他说的话的内容，但确确实实听到了声音。一个年纪较小的伙伴竟能惟妙惟肖模仿出天皇的腔调。我们围着这个穿着脏兮兮短裤用‘天皇的声音’讲话的伙伴，大声哄笑。

我们笑声响彻夏日正午沉闷的山村，荡起小小的回响，消散到晴朗的上空。随后，从高空盘旋而下莫名的恐惧扼住了我们这群不敬的孩子。我们互相看着，陷入了沉默。”^①

不必说，对天皇的恐惧，还浓重地笼罩着他们幼小的心灵。大江后来回忆说，当时孩子们怀着不安的心情四散走开，惟独他没有回家，而是沿着河边向前走，走到一个被岩石和竹丛遮掩的河岔，在岸边的竹丛里脱光衣服，然后把身子浸到水里。他抬头仰望天空，夏日的正午阳光灿烂。他感到轻松和自由，同时也因为失去为天皇效力战死的机会而感到莫名其妙的失落^②。对国民学校切肤的厌恶，和学校灌输的国家意识形态在他的内心交战，他的多重意义的生活空间开始失去平衡。

随后，在日本社会渐渐普及开来的民主主义，也流灌到四国山村。战后初期，在国际进步力量和美国占领军的监督之下，日本开始推行民主主义改革，公布了新宪法，学校的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学校的名称被废除，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制改为六三三制。1947年，大濑村成立新学制的中学，大江健三郎是该校的首届学生。在新制中学里，他学到了新的知识，更感受到与国民学校不同

① 大江健三郎：《战一代的印象·天皇》，《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9页。

② 参见大江健三郎《天皇用人的声音说话的日子》，《在日本的‘我’发出的信件》，日本，岩波书店，1996年1月。

的自由气氛,而给他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是宪法课教科书《民主主义》。这不仅因为在物质极度贫乏的战后,多数教科书的纸张和印制质量都粗糙不堪,而独有厚厚的上下两册《民主主义》印装整齐,更主要的还是书中介绍的战后新宪法的内容,特别是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的思想,深深地震撼了大江的心。对他来说,新宪法这两条主干,并不只是抽象的思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耳闻目睹的战争惨祸,使他深切体会到放弃战争这一誓言般的宪法条文的意义,主权在民的思想,则使他从天皇专制的恐怖中解放了出来,启发和鼓励他从自己的主体内部确立自我的主权^①。

但在现实生活中,战后日本的宪法精神却不断地被扭曲、排拒。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世界冷战格局逐渐形成,美国从争霸世界、控制亚洲的战略利益出发,积极扶持日本的保守政治势力,日本政府明显右转。1951年,大江从家乡转到爱媛县县城松山市读高中,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共产党领导人被免除公职的消息,他痛切意识到战后以来的民主自由氛围已经从身边消失。3年以后,高中毕业到东京去考大学,结伴同行的几个同学将要投考的竟是日本培养军官的防卫大学,这一事实更令大江健三郎触目惊心。他们同在一个教室学习《民主主义》,同在新宪法的旗帜下迎来了自己的青春,现在,在日本社会出现背离宪法中“放弃战争”誓言的风潮的时候,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让大江深感战后一代“放弃战争”道德观的脆弱,也让他体验到人生歧路的痛苦^②。

1954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从峡谷村庄到地方城市,再到繁华的大都市,尽管生活空间和时代风潮在不断变化,但故乡的记忆并没有在大江的心里淡漠,特别是在面对复杂错综的当下现实的时候,故乡的世界又成为他思考的原点和有力参照。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战后的一代与宪法》,《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32—133页。

② 参见大江健三郎《战后的一代与宪法》,《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34—135页。

1958年,大江还只是一个年仅23岁的大学生,就以中篇小说《饲养》获得日本文学界声誉最高的芥川文学奖。而故乡的风景也在这个时候跃入他虚构的世界,构成作品内在的空间。

《饲养》是一部直接描写战争时期生活的作品,但在一般被称为“战后派”的文学谱系上却属异例的存在。“峡谷村庄”这一情境的设定,使故事发生的空间带有某种封闭自足的乌托邦色彩,山村孩子的视点,更加重了这里的牧歌气氛。尽管有战争的消息传来,甚至有敌方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但对于山村孩子来说,这一切非但构不成危险,反倒增添了新鲜的乐趣。甚至因敌机失事而被捕获的美国黑人士兵,也没有让孩子们感到特别恐惧。他们先是像饲养的动物那样看管黑人士兵,但慢慢竟和黑人士兵产生了“近似人和人的连带感”。最后,导致乌托邦解体的,是县政府下达的命令和村庄里大人們的支配意志与暴力行为。在小说结尾,当“我”的手指和黑人士兵的头骨一起被“我”的父亲打碎的时候,也意味山村孩子的童年乐园从此失去。“我不再是孩子了。”这是“我”获得的启示,是小说中俘虏兵故事与山村孩子的成长故事交融起来的接点,也可以看做是大江从学生到作家的宣言。“峡谷村庄”由此而转换为山村孩子举行成年典礼的仪式性空间。应该指出,《饲养》只是大江第一次启用故乡经验,“峡谷村庄”仅仅显露出不大的一个断面,其间的多义内涵,还要在大江后来的创作中才能得到深入发掘和充分的展现。

存在主义的解体与重构

《饲养》问世以前,大江健三郎已经在东京大学的校园文学活动中崭露头角。1955年,他的最初试笔之作《火山》获得了校园内的银杏并木文学奖,1957年5月又以《奇妙的工作》获得《东京大学新闻》设立的“五月祭”奖,并引起文学评论家平野谦的注意,随

后便有一些有影响的文学杂志来向他约稿。1957年8月,大江的小说《死者的奢华》刊载在《文学界》杂志上,得到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的好评,并被推举为该年度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当然,大江的成名作是《饲育》,1958年发表当年即没有争议地获得了芥川奖,使他从“学生作家”顺利地登上文坛,转为职业作家。就文学创作而言,大江确实可以从《饲育》开始充满自信地宣告:“我不再是孩子了。”

作为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大江健三郎有机会广泛接触世界文学。在学校里,他和教授学习法国的古典著作,回到住处,则耽读20世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如萨特、加缪、福克纳、梅勒等。有一个时期,大江对萨特的特别迷恋,他曾说:“我是在读了萨特之后而突然选择了文学专业,并是写了关于萨特的文章而在法国文学系毕业的。我青春的前半是在萨特的影子下度过的^①。”年轻的大江是否阅读了萨特那些部头厚重的哲学著作,不得而知,但从他第一部小说集《死者的奢华》后记中所使用的“囚禁状态”、“闭锁的高墙里的生存状况”等词语,从他拟想的长篇小说题目“墙壁里的缓期执行^②”,特别是从《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等作品所流露出的荒诞和徒劳的况味,可以推定,大学期间,大江已经阅读了萨特的《恶心》、《墙》等小说作品。

当然,在萨特那里,哲学与文学本来就没有截然划开,而是相互印证和阐发的。按照法国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的看法,萨特的第一部小说《恶心》其实“是一份真正的哲学宣言”,并且,这部小说“是以否定和荒诞的哲学为起点,反对肯定论和价值论的古典哲学”的。在纳粹势力严酷统治、充满极权恐怖的年代,萨特存在主

① 大江健三郎:《欧洲的声音 我自己的声音》第175页,日本,每日新闻社,1962年10月。

② 大江健三郎:《关于第三部的笔记》,《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55页。

义哲学和文学的浓厚的否定性倾向，自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也具有积极的抵抗意义，“对萨特来说，这种拒绝，这种否定，就是自由的显现”^①。大江健三郎接受萨特，首先也是在一种否定的精神状态中获得的共鸣。战后日本日渐保守的社会状况，和离群索居的借宿生活，使大江感到自己和同龄的一代青年都处于被无形的囚禁之中，让人狂躁、愤怒，却又无从反抗。这样的情绪自然很容易接近萨特所描绘的“大写的墙”^②。

但应该指出，大江接受萨特，并不完全限于否定的一面，他还注意发掘萨特文学中积极的因素，这在《论〈不惑之年〉的意象》中已经有所显露。在这篇可能是大江大学毕业论文一部分的文章里^③，这位还是大学生的年轻作家表现出了颇为独特的观察角度，他不仅分析了《不惑之年》中“死”、“欲望”、“自由”等存在主义文学常见的意象，还特别注意到小说中着墨并不很多的一个人物——法国共产党员布吕内。他认为，尽管这个人物的“所有行动都枯燥生硬”，但他已经“完成了选择”，在“所有的方面，其方向都是爽朗、善良的。”而小说的主人公马蒂厄，虽然性格温文，但他没有行动，没有做出选择，总是处于非恶非善的暧昧状态。两相比较，大江认为《不惑之年》的主要人物马蒂厄、丹尼尔等都处于死的世界，只有布吕内，“可能开拓出明天的生活。”大江同时还分析到小说作者的

① 罗杰·加洛蒂：《萨特的戏剧与小说是我们时代的见证》，柳鸣九遍选《萨特研究》第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0月。

② 萨特自己解释《墙》的主题时说：“权利本不存在，是理所当然拥有的，徒劳无益。因为一切逃避都被大写的墙阻拦；逃避存在，依然存在。存在无所不包，人须臾不可离”。转引自沈志明《萨特文集·小说卷导言》，《萨特文集》第1卷第8—9页，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萨特在这里所说的“大写的墙”，可以理解为“存在”的一种隐喻。

③ 《论〈不惑之年〉的意象》一文曾收入《严峻的走钢丝表演》，大江健三郎介绍说：“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本来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小说家的生活）因为一个奇怪的原因而匆匆赶写出来的东西，在本书中首次公开印刷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大江的大学毕业论文，或是该论文的一部分。

立场和位置,指出:

“萨特不是布吕内。布吕内始终是客体,是仅只作为‘被看的存在’出现的。萨特和马蒂厄、丹尼尔一起置身于死者的领域。萨特成为死者之后,布吕内式的人的意象开拓了明天。共产主义者或者行动型的人的意象经常是被他者来理解的,这是萨特无法改变的本质性倾向。萨特,或者由萨特悲剧性地象征着的西欧,对于布吕内来说,只能是死去的他者。”

虽然表述有些曲折甚至晦涩,但大江的基本观点还是看得清楚的,他不满意萨特小说里构造的充满死亡色彩的世界,而对与作者以及作品重要人物的立场、观点颇为不同的布吕内式的他者则寄予了希望。非常有意思的是,大江对萨特及其文学的批评,和后期萨特自己努力摆脱存在主义的否定性思维,进行立场转变的路向是很接近的。首先,萨特的哲学观的转变,确实是与他者(布吕内式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①)接触与冲撞的结果,其次,这种转变,又是在反抗既存现实的积极行动中实现的。从20世纪40年代参与抵抗纳粹运动,到50年代抨击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萨特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始终站在弱势民众一边,反抗强权和暴政。就像马尔库塞所分析的那样,本来,存在主义的思想逻辑很容易导致和既存现实的妥协,但萨特本人选取的思想方向却是“彻底对抗的道路”,这就使“哲学变为政

① 布吕内的原型是法国共产党员、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尼赞(1905—1940),他的思想和为人曾给萨特以很大影响。(参见沈志明《萨特文集 小说卷导言》,《萨特文集》第1卷第22—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另外,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萨特曾认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参见艾珉《萨特文集 总序》,《萨特文集》第1卷)

治学”，而正是“在这种政治化了的哲学中，基本的存在主义概念经由向这种现实的宣战意识而被拯救出来”^①。

从上述的意义上，青年大江的精神状态和萨特是颇为近似的。他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创作的小说，大都在诉说人生的荒谬和无奈，但在同一时期，他又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大江大学毕业，正当日本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政府强行批准日本美国新安全保障条约、各界民众掀起大规模抗议的时候，他也参加了群众的游行集会，并发表了《民主主义的愤怒》等文章，批判政府践踏民意的暴行。大江的视野还扩展到国际，对在冷战格局中被封锁的社会主义国家表示了关注的热情。1960年6月，他参加日本文学家第三次访华代表团，来到和日本还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回国以后，大江参加了一些讨论安保斗争的集会，与多数热中评价斗争胜负的学者、理论家不同，大江把关心重点的放在这场斗争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他认为，斗争不会一直以运动的方式继续发展，生活将恢复平静，但安保斗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右翼政府的强压而消失。这年秋天，大江参加了亚非作家东京会议，一位非洲记者问道：通过安保斗争，从最低限度看，获得了什么？这使大江想起了日本明治时期著名诗人石川啄木的名言。当时，石川感慨社会的浑浊和民众的蒙昧，曾愤激地说：我们日本的青年人，至今还不曾和强权势力发生争执。在引用了石川的话后大江说：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的青年已经和强权势力发生了争执。我认为，这种叛逆精神、抵抗精神，已经化成了我们的血肉^②。就在这一时期，他把政治斗争题材直接引入小说，在日本左翼进步政党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被右翼少年刺杀之后不久，就创作并发

① 马尔库塞：《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第48—49页，李小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月。

② 大江健三郎：《与强权争执的精神》，《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99—100页。

表了小说《政治少年之死》(1961年2月),隐喻地表现了这一事件。日本右翼团体对作家和刊登该作品的《文学界》杂志施加压力,威胁恫吓。最后,《文学界》未征得大江同意,就发表了谢罪声明。大江愤然抗议,却引不起社会反响。以后,几次出版小说集,《政治少年之死》都被出版社拒之集外。这让大江切身体验了所谓自由民主国家言论自由的限度。

创作《政治少年之死》前后,大江关注的问题并不限于当下的社会、政治事件,他还试图从性的角度观察与刻画人。安保斗争的高潮中,一个男子在电车里调戏青年姑娘的消息引起了大江的格外注意。他把这种对社会问题、政治斗争毫不关心、整个意识里惟有女性的人称为“性的人”,并创作系列小说《性的人》进行剖析和表现。大江写性,有意反拨古典文学的暗示、隐喻方法,频繁使用具体而直接的描写语汇,甚至到了可谓之滥用的程度。大江曾解释说,这是为了把性作为一种“反存在”的因素,通过打破惯常的描写,使读者在昏昏然的日常生活中惊醒过来,发现人的意识深层的异常^①。其实,这一时期大江正热心阅读美国作家梅勒的作品,特别服膺梅勒所谓“20世纪后半留给文学冒险家的处女地只有性”的名言,不难设想,这位年轻的作家之所以大胆写性,也含有某种想要冒险创新的欲望。

不过,在萨特和梅勒之间,仍然还是前者的影响持久而深远。对于大江来说,对梅勒的迷恋,对性描写的热中,犹如青春期冲动一样,属于阶段性的,而“与强权争执的精神”,才是他“关心的最本质的主题”^②。这使他不仅亲近萨特的作品,也亲近以斗士的姿态介入社会的萨特本人。1961年夏天,大江应保加利亚作家协会邀请到欧洲旅行,从东欧到苏联,年底到达法国,正巧遇到巴黎民众

① 大江健三郎:《〈我们的时代〉与我自己》,《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245页。

② 大江健三郎:《与强权争执的精神》,《严峻的走钢丝表演》第101页。

举行反对政府建立秘密军队(OAS)的示威游行。大江挤进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和法国学生手挽着手前进。在游行的人流里,他发现了萨特。当时,萨特因为参与反对 OAS 运动、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奔走筹划而屡遭迫害,住宅被炸,讲演的咖啡店被炸,但大江看到,走在人群中的萨特周围并无护卫,只有波伏瓦在他身旁。大江为萨特和青年学生、工人如此密切而直接的联系所感动,同时也感到萨特在法国知识分子中惊人的孤独。他挤到萨特身旁,和萨特握手,又固执地提出采访的要求^①。

第二天下午,在巴黎的一家咖啡店,大江采访了萨特。但在采访中两人的话题并不特别投机。其时,大江是日本文坛风头正健的新秀,虽然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但始终把自己定位在文学家上;而萨特则早已完成了主要的哲学、文学著述,正以一个反抗强权的斗士姿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关心的重点显然在政治。这次会面,萨特完全没有谈论文学,甚至对曾担任他私人秘书的约翰·考刚刚获得贡古尔奖的新作也不置一词,这颇让大江感到遗憾和失望。

这次会面意味他们关系的重建。对于大江来说,萨特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遥远的经典式存在,跨越漫长的时空,他们走进了同一时代氛围。面对同时代的一些问题,他们的观点明显存在歧异,但大江也确实确实感受到了萨特的特殊思想魅力^②。所以,会面以后他仍然关注着萨特的活动和著述。萨特常常成为他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参照,反观自身、自我反思时一根锋利的针。《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文学有何效用》一文中大江曾就此做了明确表述。这是一篇介绍法国《世界报》登载的萨特采访录以及另外两名作家

① 参见大江健三郎《欧洲的声音 我自己的声音》第168—170页。

② 关于这次会面及大江的感受,大江健三郎《欧洲的声音 我自己的声音》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述。

克洛德·西蒙、依布·贝尔吉对萨特的批评。论争主要围绕文学的目的与功用展开,在回顾自己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的时候,萨特反省自己以前把文学绝对化、神圣化的倾向,承认: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恶心》一类的作品是无能为力的。这是萨特的自我批判,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工作提出的严峻质疑。而反弹也就由此发生。特别是依布·贝尔吉,在反驳萨特时明确地主张:所谓文学,只能是个人的拯救的尝试。这一点,希望能够得到饥饿垂死的孩子的谅解。大江之所以重视这场围绕萨特展开的论争,专门撰文予以介绍,主要不是出自文学理论方面的兴趣。自19世纪以来一直纠缠作家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日本文坛也不断被提起,在左翼的“新日本文学”大会上,大江甚至被作为非政治化的人物受到批判。所以,他不能认同萨特的放弃文学、直接投身政治的主张,同时也不能赞同依布·贝尔吉的观点。大江承认,自己思想处于彷徨状态,面对垂死的孩子,即使说得出希望获得谅解的话,过后内心也不会安宁。当然,就大江当时的实际感受来说,让他无法安于把文学仅仅定位于个人拯救的,主要是他所接触的广岛那些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他写道:

就我个人而言,比如说,在“新日本文学”的大会报告中被批判的时候,也没有感到被政治与文学密切关联的刺痛。但是,当我读到去年夏天在广岛核辐射病专门医院前烈日炎炎的广场上以微弱如蚊鸣的声音呼吁废除核武器的患者代表在当年冬末逝世的消息,内心陷入了动摇和混乱。^①

① 大江健三郎:《在饥饿垂死的孩子面前文学有何效用》,日本,《朝日专刊》,1964年8月。

大江说自己当时依违于萨特和依布·贝尔吉之间，其实他的基本倾向明显偏在萨特一边。萨特对文学功用的质疑对大江有深刻刺激。当然，大江没有跟从萨特思路得出放弃文学的结论，而是由此开始以积极的态度尝试有效发挥文学的社会效用。他的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系列随笔《广岛札记》的写作上。

《广岛札记》在大江的文学谱系里具有特殊意义。这部随笔汇集了作家60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不仅描述了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的人们的种种痛苦，还突出表现了广岛人抗拒灾难顽强生存的精神。大江以特别浓重的笔墨记录了核辐射病专门医院院长重藤文夫，他本人就是核辐射的受害者，不仅忍受着病痛折磨，以顽强的毅力研究治疗办法，还为核辐射病专门医院的建设四处奔走呼吁。大江被重藤的精神所深深打动，他觉得，自己至今为止形成的感觉、道德和思想，都要在广岛这把锉刀上重新敲打，透过广岛这块视镜重新考察。

其实，在广岛采访和写作期间，大江自身正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危机。1963年6月，他的长子出生，因为头盖骨异常动了手术，手术后智力也不健全，作为一个年轻的父亲，大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却痛苦不堪，内心深感颓唐，打不起来精神。广岛之行使大江的精神受到砥砺。在写作《广岛札记》的同时，他也以自己的畸形儿出生为素材，写作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把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炼狱升华为文学作品。遭受核辐射与畸形儿的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个人的体验》中年轻的父亲鸟面对残疾儿的现实，苦恼、动摇，甚至想把孩子弄死，最后终于走过心灵炼狱，勇敢接受现实，决心和残疾的孩子一起开创共同生存的道路，在精神上获得了新生。在小说结尾，鸟和他的岳父的对话中，出现了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词汇：“正